

# 我国社会心态评估的方法论初探

陈怀远

**【提要】**在我国取得大量成果的社会心态评估报告中，真正贴近实际和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并不多。其中主要原因除了量表工具不成熟外，就是方法论的理论探讨还欠深入。文中结合我国社会心态评估的现状和情势，从方法论的角度梳理程序和探寻问题，以摸索从根本上逐步打牢我国社会心态评估科学化基础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心态 评估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3)02-0203-07

我国将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存在的折射现象和社会转型时期凸出的群体情绪基调进行考察，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开启了我国社会治理打破“摸着石头过河”行动惯性的先河，而且开创了我国学术探讨超越西方概念架构的新局面。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黎朋（Le bon, 1895）便开创了社会心态的研究，但他对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的社会心态研究已经不能成为我国现实研究的范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之大是世界瞩目的，对随之产生的社会心态的变化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的普遍关注。比如，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人际信任、安全感及其变化等一些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sup>①</sup>，尤其是近几年又将量化实证考察方式引入社会心态评估范畴，这已不是早期研究框架能够包容的了。

## 一、我国社会心态评估的现状和情势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对社会心态的理论研究和现状评估已取得大量成果，从文献检索情况看，仅1979~2006年，相关论文与专著就有1431篇（部）<sup>②</sup>，还不包括大量应用文章和新闻报道。从总体讲，这些成果对社会心态的表现、作用、形成原因和调节目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在一些专业研究人员看来，就从“心态史”角度考察而言，改革以来对现实社会心态反作用于实践的性质评估虽有进展，而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心态分析却很少”<sup>③</sup>。这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心态分析评估尽管成就斐然，可如做“治史”之用还有明显差距。

### 1. 我国现阶段社会心态评估已取得几项突破

(1) 从随机应用型模式发展到基础建构型模式。80~90年代,我国的社会心态分析还沿袭思想动态反映的传统,着眼于社会控制思维的应用,采用随机记录和分析的方式,过一段出一份报告,每份报告因地因时因事而变,可谓与时俱进,各不相关。这种做法与改革之初社会体制结构单一,思想禁锢,社会意识形态一元化,自我认知演变被动性突出等社会基础条件相对应,不需要对社会思潮作跨越式描述。可9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阶层生活地位和心智意识分化加大,他们各自认知演变的主动性增强,诉求表达和情绪宣泄的渠道不一,社会心态反映的群体属相多元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现阶段社会心态评估的传统作业方式逐步落后,随机应用效果不仅显得散乱,并且缺乏积累。例如评估方法差异导致评估结论偏颇。在对现实社会心态的表现进行描述时,许多评估都把一些现实社会意识当作社会心态的表现予以直接勾画,冠之为社会群体的“活思想”或“思想状况”等;而另一些评估则把社会心态看成是“心理态势”,是某些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并不是某种主观意识的直接表达。这两种评估方法都有合理之处,也有某些不足。前一种把判断性语言直接看成是心态表露,如“郭美美炫富必然为富不仁,不可能广施善缘。”将这种语言看作是“仇富”心态的表达,既简单又可能正确;不当之处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赞成这句话的人不一定抱持“仇富”心态,很可能就是对郭美美做派的不满和批评,仅此而已。后一种评估不依靠判断性语言,而是从社会成员行为表现中抽取概括,其优点在于它是一种客观判断,局限性是运用中很难摆脱评估者自身的主观操纵。如2011年5月有一篇报道认为“我国纪录片发展沉入低谷,浮躁社会心态系主因”,该报道采访的某传媒大学教授认为,导致中国纪录片发展沉入低谷十年的主因,在于浮躁的社会心态。现在的中国人总是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欣赏、思考、品味……也因此,嘻嘻哈哈、打打杀杀、畸情绯闻控制了人们的眼球,大众的精神生活粗鄙浮浅,离纪录片这种需要品味和反思的东西越来越远<sup>④</sup>。然而,当这样的评估结论出笼刚满一年,2012年5月,网友在百度贴吧里发帖称,“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CCTV-1综合频道首播完毕,没有大肆宣传,没有明星大腕,没有靓男美女,其就这样火在午夜,火在银屏。”这一例证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一些事件与社会心态表现有关的评估做得主观臆断,极不靠谱,毫无科学性而言。

尽管开展社会心态评估困难很大,甚至社会心态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并未进入主流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如果我们翻看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几乎找不到“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这个词,但对身处经济社会体制转换时期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表述及其相应的评估报告早已耳熟能详<sup>⑤</sup>。近几年,随着各级政府机构更加重视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和塑造事宜,理论界和相关咨询机构也加强了社会心态评估与预警的基础设施或平台的搭建工作。为了积累经验和数据,我国一批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开始着手建立年度研究机制。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发表《2007中国民众心理和谐状况研究报告》;从201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年度蓝皮书,从理论价值甄别到评估体系构建、再到测量标准及其工具筛选、预警和调适方式斟酌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探讨,并取得了相对以前来说更有实质性和跨越性意义的进展。

(2) 由背景描述性评估为主朝调查数据分析性评估为主转向。所谓背景描述性评估,即寻找与主观性判断(语言)有间接联系的客观性指标来综合评估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单纯的思想意识推演起到背景性的佐证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对飘渺的心态描述发挥替代性作用和可捉摸的证伪功效。也就是说,若要对某个社群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或行为模式进行评估时,我们除了对他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言行进行考察外,还要对其职业特征、知识水准、经济利益、社会行为

习惯、生活方式及习俗等背景情况展开细致的梳理，测度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如果要描述弱势群体的社会态度，不仅要分析他们在特定境况下的具体言行，而且应联系他们职业位阶、从业经历、文化基准、收入增减、组织程度、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现实和异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取舍自如、操作简便、符合规范原则、利于宏观描述，不足之处是高度依赖评估者的学养水准，其判断难于证伪，并不能及时发现细微的差异和变化。我国在社会心态评估活动开展的前期，由于组织化程度低，调查缺乏设计、资金、技术处理工具等软硬资源投入，活动处于个体参与为主阶段。当时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评估预测报告，但除了个别宏观和历史的“回望”巨作外，大多是运用背景描述性评估手段所做的应景之作，只有“回望”价值，而欠缺预测功效。甚至产生以讹传讹现象，许多评估者对社会心态负面效应的分析，不仅人云亦云、先入为主，而且对群体中个体心态转移和换位的描述几成定势，那就是随“恶”则恶，遇坏而坏。最令人忧虑的是，上述评估方法难以证伪的后果极大地损害了评估报告的可信度。当大家都说“羊是白的”时，若没人找到一只黑羊，那就只能默认这个“羊是白的”的说辞。问题是“社会心态”一词本身暗含着全称判断的非排它性逻辑，一旦用这个词来表示某些只有部分群体共性的不良心态，那么这种缺少数量测度的判断，就可能扩大或遮蔽它在社会中实在的体量和位阶。

正是看到背景描述性评估方法的局限性，调查数据分析性评估方法才在我国社会心态评估活动中日益兴用起来。调查数据分析评估方法在我国社会心态评估活动中的运用并非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的。事实上它除了需要人力组织和资金投入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评价指标和测量工具的构建与测试。我国现阶段社会心态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编制工作，是建立在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幸福感测量指标等方面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前两项测量技术的总结与修正来发展的。社会心态测量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系统，从主观自陈测量为主到自陈与客观测量综合，从测量到评价，可以说从前两项研究中得到大量借鉴。例如，由生活质量所涉的对工作、收入、社交和婚姻等满意度测评<sup>⑥</sup>，到以快乐论为基础的主观幸福感和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综合测量技术发展走向<sup>⑦</sup>，无一不对社会心态指标设计以重要启发。目前社会心态评价指标及测量工具的设计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已根据自己的设计展开了测评实验，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3) 社会心态评估成果需求迅速增长。我国对社会心态评估现状的重视，首先得益于各级政府机构出于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他们亟待取得各自辖区社会心态的监测报告，以便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疏导消极的社会心态，防止破坏地方稳定秩序的群体事件发生。目前许多地方，尤其是县级政府都将建立社会心态评估预警机构作为地方加强社会管理、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的重要举措。虽然他们进行评估的目的大都出自维稳思维，目前基本处在“有想法、无办法”的境地，但这种激活的需求无疑是整个社会推进社会心态评估工作的“强心剂”。

其次，了解社会心态成为社会组织的需求。这些社会组织包括一些政府机构当然不是为了解公共秩序之“围”，而是由于更深层的文化战略企图来发起社会心态测评活动。如我国的一些社会调查咨询机构、社区卫生（心理）服务中心<sup>⑧</sup>以及作为“单位制”解体后填补进来的一些社会支持服务机构（如知心姐姐夏令营、妈妈社团）等，他们的社会心态调查更具体、更专业，也更有针对性。200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栗陆莎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走出单位：中国员工单位心态分析》。该书针对中国员工在跨国企业里鲜有进入领导本地化职位的现象，从员工本身

的职业心态着眼分析评判，提出了适应未来公民社会建设，我们应提高超越制度的领导力，领导自己，走向世界，在改造体制的同时改造我们自身心态结构的任务。相信今后围绕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的目标开展社会心态评估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再次，了解社会心态既是社会组织的需求，又是社会成员的需求。作为社会成员个体，解读当前社会心态和国家历朝历代社会心态同当时社会联动的关系等知识，是其丰富自身阅历、追求人生价值、定位生活动力的必备条件。这种个体需求，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进步，精神生活开放而愈加强烈。

## 二、社会心态评估中的方法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心态评估实践从总体上看，存在两大方面问题，一是在学理上缺乏系统和规范，在调查中满足于针对直面和率性的问题，而未立足于构建比较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较为长期而全面的研究性评估；二是在实践中把社会心态评估当成了解和汇集社情民意的事情，数量分析不会做，定性评价随意估。具体来讲有以下一些问题：

1. 混淆了反映社会心态和评价社会心态的界线。仅从字面上看，反映就是记录和呈现，它可以是单层次、某一侧面的，也可能是多层次抑或立体化的，总之反映除了视角独特外，还可能出现“盲人摸象”的真实性局限；而评估则不同，它是建立在反映基础之上的，属于二次加工，不仅要记录和分析，还要进行比较甚至去伪存真地甄别或遴选，虽难以绝对保证获取全真信息，但比初步反映做得相对地广泛而深入。这里所讲的混淆，不单指涉上述字面意义的，而主要指社会心态“评价”本身。一些评估经常把这种社会心态属体本身的“评价”，当成社会心态评估报告提供者对社会心态属体本身“评价”的评价。因此，前一个“评价”很容易取代后一个评价，直接取消了评估报告者对调查信息的二次加工程序。现在“一叶知秋”式的评估报告发布很多，而建立在数量分析基础上，进行正价与负价比较后的全面评估报告则少见，因此这些评估的政策效度不高几成事实。

2. 评估观念偏执狭隘，仅着眼于干预和控制，使自陈量度调查受到一些心理反射和移情思维的干扰。由于大多数社会心态评估的政策目标定位于“维稳”，这样的调查目的说明对被调查者有十分明确的意图暗示，引导性极强。一些社会阶层对社会冲突归因的话题较为敏感，许多人都不自认本人是当前社会既得利益的受益者。如一些公务员，甚至是把握经济资源支配权柄的企业经营者，都在问卷调查中，亲口表示自己是中产阶层和利益集团得势阶层身份俱乐部的不在场者。

另一方面，在田野调查中一些问卷的设计，忽视不同群体的生存场景、文化积淀和理解特点，也是导致调查对象自陈内容受限和调查评估结论失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某些城里人看来，农民相对其他职业群体来说，无论收入还是权利等许多方面都属于弱势群体，其社会态度自然消极一些<sup>⑨</sup>。但恰恰相反，一项由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开展的分布全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域24个城镇的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群体相比其他职业群体的社会态度而言是比较积极的。”<sup>⑩</sup>另一份由中科院心理所做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和谐程度要高于城市和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心理和谐得分落后于农村和城市居民，处于最低的水平，心理和谐程度最差；东部地区总体状况低于中西部地区。”对此情况，一种解释认为这可能与农民工所选取的参照物有关。进城务工人员尽管生活在城市，但其身份定位仍在农村，因

此他所参照的对象并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家乡的农村居民<sup>⑩</sup>。这种解释是否合理，还需事实材料加以审慎的验证。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工业化或农民“个人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农村居民户籍还未变更为城市居民户籍之前，无论他们到哪里打工，只要家里还有承包地，他们都可以做到心里不慌，甚至于地荒人不慌。如果在外遇到就业困难，大不了回家种地。这就是农村社会心态失落的底线。

一些调查者总爱以自己的感受代替别人的思维，以自己的评价取代别人的评价。经常听到一些重返乡村的城里人感叹，如今农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谋生了，土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公共基础设施又长期废弛，给人以景气衰败的感觉，因此他们得出“乡村很自卑”的社会心态估判。一些城里的“人们并不是不再关心乡村，他们太关心了，他们比慢条斯理的乡村更关心乡村，他们关心的是乡村消亡的速度还不够‘更高、更快、更强’，他们那种拯救式的关心加速了乡村的自卑和毁灭。”<sup>⑪</sup>

而事实上外出打工虽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户兼业经营的重要方式，但放弃农作举家外出谋生的仅占极少数（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11年对湖北330个村，175779个农户截至2010年举家外出情况的调查，发现累计举家外出的户数、人口、男劳力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和总劳力的6.5%、6.1%和6.7%，且当年举家返乡超过举家外出的户数<sup>⑫</sup>）。这说明，大多数农户对农业经营的信心并未丧失，农民在谋生中思变的心态仍然是以土地经营来“坐底”。这样的变迁是安全和自主的。那种认为农村居民在城镇化中会放弃农村，他们与城市居民比较是弱势群体，其社会心态表现为“乡村很自卑”等估判，也许是城里人替他们做的移情似的理解。否则，我国粮食生产在灾害不断的年景下连续九年获得丰收，实难解释。

3. 评估方法单一，常为成本约束和时间压力而删减必要的程序和机制。我国社会心态评估方法模式单一，除了有指标体系和数据库尚未建立，自陈量表工具也未定型，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开启等困难外，关键还在调查评估的组织涣散与作风疲沓等内在原因阻滞。本来，实施社会心态调查这种主观意识强烈的测量评估，其困难就比一般能够进行客观检验的评估大得多，因此传统的我问你答、你讲我听的调查方法很难沿用。为防止自陈量表易受到被测者记忆偏差、反应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已有调查者尝试运用诸如记忆测量、生理测量、微笑评估和他人报告等新方法来纠偏。一些学者也探讨了完善社会心态调查的评估方案：(1)在心理现象之外寻找评估的客观标准；(2)在社会震荡和连锁反应的社会时空界限中寻找数字化依据；(3)在传播途径、范围以及间接反馈中寻找预测评估指标；(4)把握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过程；(5)建立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量化评估数据库<sup>⑬</sup>。但由于成本约束和时间压力的双重作用，克服主观调查弊端的设计往往被部分调查者的主观发挥所替代。一些评估者将苗头当主流、潜在当现实，将随机当随便、特例当普遍；甚至利用网络便利相互传抄，以讹传讹；不分时点断面，以总体描述代替演变过程描述，以防范风暴的“青萍之末”探讨代替心态正负效应的综合评估。总之，缺乏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是克服困难、拓展预测方法及评估机制的最大障碍。

### 三、评估方法科学化相关问题

评估方法科学化，要注意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不应偏废。在当前逐步注重田野调查的前提下，以下几个相关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 1. 维稳目标导向还是人类本性的地区检验导向

毫不隐讳地说，当前各地重视社会心态评估，其直接的出发点就是面临社会维稳的需要。然而在这种目标导向下，不仅调查者方面会先入为主地筛题设计，而且被调查者方面也会被强制性引导，或为摆脱操控而故意逆反式自陈，致使调查评估滑向“先天失聪”的演绎游戏。

要使调查评估贴近实际，就要将社区作为人类学的透视单位，进行地方民族志式考察。要结合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等一些重大场域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诸要素，对观照群体做类似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动力”和“心理变异”那样的研究。这才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地区检验性导向。它对评估的引导不带强烈的功利思维影响，尽管也有调查设计，但只会描绘记录，不会抢镜操弄。

为了获得相对客观一点的自陈式问卷调查，我们的提问除了政策话语外，非引导式的知识话语提问要更多一些。这就是说，即使对一地政府来说，社会心态调查评估的视野应该更宽些，因为当地群众的社会心态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环境如何、制度如何、文化如何自然决定和影响其社会心态如何。不能以干预或控制思想的意图来维稳，关键还是要靠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就来培育和疏导现实的社会心态。这样客观和全面的社会心态评估应该是当地政府工作好坏的试金石。但目前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命题而着手开展社会心态调查评估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例如对“部分群体成员对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要好于对现状的评价”这样的调查结论，为什么不能做进一步的追问？目前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测就是调查仅止步于维稳的思维，有了无伤社会秩序“大雅”的预判后，还有进一步追溯的必要么？

### 2. 把握社群心态变迁的生理自然基础

上个世纪，心理学曾采纳了达尔文著名的观点，即各种族的情绪表达有功能性、适应性的本质，因而开始对情绪、认知和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性研究<sup>⑤</sup>。这就是说，情绪与心态一样，都是行为主体向外界显示行为动机当前状态的重要信号。这种信号能够指导和塑造人们的认知过程，如果行动者（研究者）希望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而不是被各种因素干扰分散，他们就必须学会从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来管理和排除这些干扰。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都把注意力摆在情绪或心态调节与控制有目的、有意识的形式上，然而最近的研究对于人的情绪（心态）自我调节无意识形式的了解已获重大突破，这一机制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中分别被称为知觉——行为联结和“镜像神经元”效应。神经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际互动的各种目标努力能被无意识地激活，进而指导信息加工和社会判断，所以无意识目标寻求模型实质上反映了无意识情绪（心态）调节的存在<sup>⑥</sup>。这告诉我们，人的神经系统可以对突发事件做出有效的应激反应，冲动所造成的问题往往不在于冲动本身，而在于人们提高应激能力的缺省状态。

### 3. 遵循社群心态变迁的历史文化脉络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我们对社会心态的评估，必须充分注意到被考察群体的精神意识生活及其历史文化脉络。例如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机制建立之前，我们评估农村社会心态，就要留心观察家族、宗教等文化象征资本再生产方式对乡村社会心态的影响。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旧有的家族、宗教等象征资本“回潮”及其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出人意料。一些乡村新势力把家族和宗教当作获利资源加以利用，他们纠集家族或宗教组织成员把持乡村权力，构建自己“盈利型经纪”小团伙；而相应的是，大多数村民也在家族或宗教的组织下寻求“保护型经纪”模式与之对弈，以争取自身被剥夺的利益。这是现在农村许多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旧政治文化内卷

化<sup>⑩</sup>的背景。它是乡村民主政治和法治秩序发展，在旧文化网络破坏后没有新的文化网络替代时的一种回溯式反应。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观念都被博弈两边群体的家族或宗教信仰所曲解和误解。他们对家族或宗教的信任被利益博弈的实用观念所驱使，很难顾及到民主政治和法治秩序的真正价值。这是当前乡村社会心态演绎的历史性局限。

在乡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乡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存在差异，农民工仍会把乡村家族或宗教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搬到其流动就业的城市中来，以与其雇主方、本地居民方等非我群体再做利益博弈之用。大多数情况下，本来他们的维权诉求是正当的，但由于其对城市群己关系的曲解和误解，往往产生较敏感的移情反应，把其乡族利益扩大化，形成过激的城乡群体隔离心态，导致不良的象征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冲突后果。

没有这种历史文化的参照，我们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各类社会群体心态变迁的脉络，尽管有时它们仍带有一些旧时代政治文化的痕迹。

---

①杨宜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及其变迁研究》，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yangyiyin/grwj\\_yangyiyin/t20050117\\_4535.htm](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yangyiyin/grwj_yangyiyin/t20050117_4535.htm)，杨宜音个人文集：2005年1月17日。

②程家明 《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述评》，广州 《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③⑤杨宜音、王俊秀 《社会心态蓝皮书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④郑键 《我国纪录片发展沉入低谷 浮躁社会心态系主因》，北京 《检察日报》，2011年5月27日。

⑥苗元江 《幸福感：指标与测量》，广州 《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⑦王燕、李悦、金一波 《幸福感研究综述》，河南开封 《心理研究》，2010年第3卷第2期，第14~19页。

⑧李婷玉 《心理服务进社区的路径与方法》，上海：《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0卷第5期，第70~77页。

⑨刘霁雯 《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态初探》，武汉：《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⑩马皑 《中国人心态扫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0年，第47页。

⑪黎明 《农民工心态为何好于城市居民》，上海：《东方早报》，2007年11月15日。

⑫于坚 《乡村很自卑》，广州 《南方周末》，2012年5月10日。

⑬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农村居民处提供。

⑭李合堂、高永强 《社会心态调研的路径方法和价值评估要领》，石家庄 《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年第8卷第9期，第118~120页。

⑮⑯詹姆斯·格罗斯主编 《情绪调节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9页、第403~404页。

⑰张小军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北京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53页。

作者简介：陈怀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 左晓斯]